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扩大后的检测指导方针应该认识到现实

没有真正的资源，模糊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

（2007年5月30日，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说：扩大获得HIV检测的机会在抗击艾滋病工作中十分重要，但新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指导方针在能够使检测成功的条件上只是开空头支票。人权观察是在回应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所发布的关于提供者发起的HIV检测和咨询的新指导方针。

指导方针适当地排除了义务或强制检测，呼吁有适当的“有利环境”和可用的HIV预防、治疗和护理的“适当资源”的国家采用扩大的、以健康设施为基础的检测。但人权观察警告说，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很少拥有适当的资源和环境。

“扩大后的HIV检测对艾滋病疫情影响很小，除非在普遍获得预防和治疗的机会上有真正的承诺，”人权观察HIV/艾滋病项目主任Joe Amon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担心没有‘有利的环境’，在扩大检测上会有真正的风险，这是正确的。人权观察有大量文件证明存在强制检测、破坏保密和对HIV感染者的暴力。”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指导方针说，除了扩大获得HIV检测的机会之外，“必须作出同样的努力，来确保支持性的社会、政策和法律框架到位，以便使积极结果最大化，使对病人的潜在伤害最小化”，这包括：社会动员，医疗保健提供者培训，强有力的监督和评估系统，以及反对基于HIV状况、高危行为或性别的歧视的法律和政策。

人权观察指出：很少有国家有到位并得到执行的强有力的法律框架，许多地区和国家的资源不足。全世界不到10%的注射吸毒者能够获得HIV预防。非洲约有同样比例感染HIV的孕妇能够获得预防母婴传播所必需的药物。联合国制订了2010年普遍获得HIV预防和治疗的目标，但目前7百万急需治疗的HIV感染者中估计只有2百万人得到了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必须做得比提供具体的指导方针和含糊地呼吁更好的政策和法律框架更多，”Amon说，“扩大获得HIV检测的机会很重要，但只有在同时有更好的预防和治疗工作，并且结束对HIV感染者的歧视的情况下才会管用。”

人权观察致力于HIV检测工作

以下证言来自人权观察关于HIV检测问题的报告：

暴力对待妇女

“我已经结婚了，但我是一个人来（检测）的。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他说：‘如果我知道你是阳性，我会杀了你。’我们曾经吵过架。他打我。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我害怕（孩子们）会告诉他，他们被扎了针。我甚至不能让孩子们检测，因为他会生气，问为什么。”

——人权观察采访Alice Namagembe，2002年12月13日，恩德培（Entebbe），《只是安静地死去：乌干达的家庭暴力和妇女对HIV的脆弱性》。

“我害怕告诉他我去做了检测……我希望他们先和我商量，直到我相信它……我害怕他会认为我欺骗他。他可能会杀了我，而我想活。”

——人权观察采访Masturah Tibegwya，2002年12月18日，卢韦罗（Luwero），《只是安静地死去：乌干达的家庭暴力和妇女对HIV的脆弱性》。

歧视

“我姨妈希望我们自己找住宿的地方，因为我丈夫和我有病。有些人认为如果你和感染HIV的人待在一起，你就会感染上病毒。房东歧视感染HIV的人。我试着租一个房子，但他们一知道我的情况就说不。如果你HIV阳性或者是残废，他们会说不。你不能说你的情况：你不得不保密，因为如果房

东发现了，他们会把你踢出去。”

——人权观察采访Nelly S.（不是她的真名），2006年4月22日，Mabvuku，《没有光明的未来：津巴布韦的政府失灵、人权虐待和充满浪费的抗击HIV/爱滋病进程》。

“我们本来打算送我们的女儿去幼儿园，但在那里你必须出示医疗记录，因此我们不能送她去。”

——人权观察电话采访Elena P.，2004年6月15日，彼得堡，《阳性者被抛弃：俄罗斯对HIV阳性的母亲及其孩子的污名和歧视》。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他们离开，否则他们就不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而且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大约九天时间中他们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家里。只有Bency和Benson（两个HIV阳性的孤儿）在这里。”

——人权观察集体采访Geevarghese John、Rev. K. Y.、Jacob、Bency和Benson，2003年11月23日，喀拉拉邦（Kerala），柯拉姆（Kollam）地区，《未来被遗弃：印度对感染HIV/爱滋病的儿童的虐待》。

在获得工作上和工作场所中的侵犯人权行为

“他们做了一个检测。他们不告诉你它是什么。他们只是取你的血，就在那，然后他们解雇了我。”

——人权观察采访Gabriela López，2004年1月13日，拉罗马纳（La Romana），《不平等的检测：多米尼加共和国对感染HIV的妇女的歧视》。

拒绝给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其他医疗

“我给了他们检测结果，而他们不想给我治疗。……他们让我去干活，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注意我。……我倒在地上，没有人扶我。最后清洁女工扶起了我。他们甚至不给我的婴儿洗澡：一开始他们不让我看他。他们把他给我的时候他很脏。我知道是因为这个（我的HIV状况）。”

——人权观察采访Rosalía Rodríguez，2004年1月15日，圣多明戈（Santo Domingo），《不平等的检测：多米尼加共和国对感染HIV的妇女的歧视》。

“医生对护理人员说：‘你为什么给我带来一个爱滋病人？你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她真正应该去的地方。’他的意思是爱滋病医院。他拒绝给我治疗。”

——人权观察采访，2005年7月7日，尼古拉耶夫州（Mykolaiv），《花言巧语与风险：人权虐待阻碍乌克兰的抗击HIV/爱滋病工作》。

缺少保密/咨询不足

“三个月之前，我生产了。他们给我做了一个检测，然后在我生产之后，他们过来告诉我，我不能母乳喂养。医生说我必须让我丈夫帮忙。他们在我丈夫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他们在告诉我（我HIV阳性）之前已经告诉他了。”

——人权观察采访Jessica Torres，2004年1月14日，圣佩德罗德市（San Pedro de Macorís），《不平等的检测：多米尼加共和国对感染HIV的妇女的歧视》。

害怕虐待/歧视

“你的家人不和你一起吃饭，他们给你食物，让你在别处吃吃，他们不跟你接触。你的朋友不理你。他们害怕通过偶然接触传染上。如果你递给他们一只烟，他们不会要的。”

——人权观察采访韩，2002年，云南昆明，《锁上的门：中国爱滋病感染者的人权》。